

明代

其心休休焉

十句



于謙

國家任相臣以有容為利也夫相臣能容而有技彥聖至矣國

以有容為利也夫相臣能容而有技彥聖至矣國

於一人也則必

八股文

探

無技者可也彼

以象其心者曰其心休休焉其

夫才不窮於草野窮

大臣曰休休蓋無所吐者如有茹也才蓋於登庸不盡於虛受

又起奇

休休蓋無所拒者如有納也而有技彥聖何不容之有見為容

其容不廓若寸才尺藝皆自身之故靈則止戒一已而可者

自謂容者其容不真若推賢好德苦中懷之莫喻則惟有一好

◆ 葵篤清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敘中二
容字貫
由下

數簡二
講得法

◆ 龚笃清 著



八股文史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八股文史探/龚笃清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2

ISBN 7-5438-3990-3

I.明... II.龚... III.八股文—研究—中国—明代 IV.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0124 号

责任编辑:许久文

装帧设计:陈 新

明代八股文史探

龚笃清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富洲印刷厂印刷

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625

字数: 558,000

ISBN7-5438-3990-3

H·155 定价: 47.00 元

引言

明代八股文述略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文体像八股文那样集合着如此深刻的背反现象：它培育出了成千上万的名臣循吏，又摧残、扼杀了许多具有真才实学之士；它维护了明清两代社会、政治的长期稳定，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它有效地提高了士人的思维能力，又严重地束缚了士人的思想……

它像一个箭垛子，招来了无数的爱 and 恨。许多才华横溢之士或因蹭蹬科场，久困场屋，功名不遂而对它恨入骨髓，或因虑及深远，看到其弊端而对它进行过批判甚至是谩骂。

在明代前期，因八股文自身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对

①陆深：《国
学策对》，
《皇明经世
文编》卷一
五五。

②《桂文襄
公奏议》卷
三，《论修明
学政疏》。

③《震川先
生集》卷之
七《三舍示
学者》。

④张岱：《文
苑列传总
论》，凤嬉
堂抄本卷
二〇二。

⑤张岱：《石
匱书·科目
志总论》，凤
嬉堂抄本卷
二十六。

⑥顾炎武：
《日知录》
卷十六《科
举》。

⑦《颜习斋
先生言行
录》卷下。

⑧澄清堂
稿：《故江宁
县前翰林院
庶吉士袁君
枚传》。

它持批判态度的士人尚少。自进入明代中期以后，对它持批判态度的人便多了起来。如正德时国子监祭酒陆深便说：“举业者，进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今日举子，不必有融会贯通之功，不必有探讨讲求之力，但诵坊肆所刻软熟腐烂数千馀言，习为依稀仿佛、浮靡对偶之语，自足以应有司之选矣。”^①

当过大学士的桂萼在嘉靖前期指出，当时的士人，“经书初解章句，便拟题作文字，竟为浮华放诞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致破裂经传”^②。

明代八股文大师归有光“八上公车不遇”，悲愤之余，把八股文视为“攫取荣利之资”^③，“如人涕唾”。乡试屡为败北，终生只得一领秀才青衿的晚明著名文士张岱则说：“六经子史，商彝周鼎也；唐诗元曲，法书名画也；明之八股，则泥佛彩花也”；“虽穷工极巧，旋瞬即坏”^④。“诸体之难，无过于制义，盖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销磨豪杰之志气也……嗟嗟！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⑤

顾炎武在总结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时指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⑥

由于八股文的弊端到清朝已暴露无遗，故受到的批判更多，更加猛烈，也更为深刻。

王夫之、黄宗羲、戴震及其他进步学者均对它进行过抨击。清初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颜元的批判尤为深刻，他说：“八股行天下，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⑦

清代著名才子袁枚，“幼有异禀，年十二为县学生”^⑧，

却连试数科皆不中举人，故对八股文衔怨极深，说“时文加以割裂搭截，侮圣人之言哉，且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摩口吻为工”。^①

爱国思想家龚自珍才华冠绝，也曾久困科场。切肤之痛，使他对八股文有深切认识，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认为毫无用处，后来竟把平生所作八股时文，一火焚毁。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中国，民智渐开，要求改造，甚至废弃八股文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八股文成了众矢之的，其中以康有为对八股文的批判最为激切，也最有代表性，他说：“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渐乃忘为经义，惟以声调为高歌；岂知道圣言，几类俳優之曲本。东涂西抹，自童年而啾唔模仿；妃青俚白，迄白首而按节吟哦。既因陋而就简，咸闭聪而黠明。”^②

然而，明清两代绝大多数士人，其中包括许多才智之士都对八股赞扬备至，薛暄就说：“虽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于义理，能发明性之体用者始预选列，类非词章无本者之可拟也。”^③像李贽这样非孔斥圣的人，却把八股文称为“古今至文”。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④何良俊虽反对八股取士中“读旧文字”，仍说“愚以为自汉以来，取士之科，莫善于此”^⑤。

① 袁牧：
《小仓山房尺牍》卷三
《答戴敬咸
进士论时
文》。

② 康有为：
《请废八股、
试帖、楷法
试士，改用
策论折》。

③ 《薛暄全
集》卷十七
《会试录序》。

④ 李贽《焚
书》卷三《童
心说》。

⑤ 何良俊
《四友斋丛
说》卷三。

以讲求经世致用而著名的左宗棠只中过举人，对科举考试一直怀恨在心，却对八股文颇有好感。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正月六日，他从浙江龙游大营给其霖儿写信说：“今之论者动谓人才之不及古者，由于八股误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诟病。我现在想寻几个八股人才，与之讲求军政，学习吏事，亦了不可得。间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较之他人尚易入理，与之说几句《四书》，说几句六经，即目前事物随时指点，是较未读书之人容易开悟许多。可见真作八股者，必体玩书理，时有几句圣贤话头留在口边，究是不同也。”

士人们对八股文的情感之深，从废除八股文时所掀起的轩然大波即可看出。尽管到清朝末年，八股文陈陈相因，毫无新意可言；《四书》《五经》中之文句，无不作为题目写过千万次，所谓“代圣贤立言”，只不过是抄袭前人的现成词句，而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民主知识的冲击，更使广大士人和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八股文的种种弊端而群起攻之，然而，当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德宗皇帝下诏于明年取消以八股文取士时，神州大地竟是一片悲痛惊惶之声，由此可以看出广大士人对八股文感情之深。

如此深刻的背反现象，如此分明的爱憎情感无不在启示着我们：对八股文要作全面的、客观的、深入的分析研究，才能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任何简单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轻率的、错误的。

如果对八股文作全盘否定，那么下列问题就无法回答：作为一种科举考试文体，它为什么会沿用五百多年而不废？难道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明清两代以这种文体为

主培育、选拔出来的各级官员有效地治理着这个国家，长期维持了其社会稳定，难道就没有其长处？在这种文体历经五百多年的写作训练之下培养出来的正反虚实、起承转合的思维方式，已成为一种民族心理积淀，至今还在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习用，难道就不应该探究其原因？

假如对八股文作全盘的肯定，那么我们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它会摧残人才，败坏学术，扼杀个性，从而招致许多目光远大，具有真才实学者的批判。

所以，应该对八股文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这是从事明清两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基础。离开对八股文的正确把握，要弄清明清两代的历史，那只是一句玩笑话。

而要把握八股文的真谛，又必须从明代八股文的研究开始，因为这是八股文的源头，八股文的创始、定型、繁盛、演变都在这个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一定意义上说，把握住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史就等于把握住了整个八股文。

八股文是朱元璋建立科举制度时创制的。

洪武三年庚戌（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开科取士诏，是年八月，在京师及各行省举行了乡试。“初场试《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次年正月，又“令各行省连试三年”^①，三月，在京师举行会试。由于所试的《四书》疑问及经义所采用的仍是元代的格式，以此作标准选拔出的官员不符合朱元璋欲藉科举选拔具有儒家正统思想治国人才的理念，故洪武六年癸丑（1373年），深感失望的朱元璋下令暂停科举，而对选用什么样的考试文体

①《明太祖实录》卷六十。



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一停便是十年。在这十年中，朱元璋和刘伯温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比较，创制了后来发展成八股文的明代制义，并于洪武十五年壬戌（1382年）诏令重开科举。

张岱说：“我明自高皇帝开国，与刘青田定为八股文字，专精殚力，一题入手，全于心灵精脉声口骨节中揣摩刻画，较之各样文体，此为最难。三场取士，专注头场。”^①张岱所述，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朱元璋创制八股文的情况。

朱元璋在最终确定采用科举制后，即以八股制义取代宋元经义，以之作为取士的主要依据，这就是《明史·选举志》中说的“其文略仿宋经义”。

在朱元璋精心构撰的八股制义中，文题是其灵魂，文章的实质内容，即体现在文题之内。朱元璋和刘伯温吸取宋经义的做法，规定八股制义的文题必须出自《四书》《五经》。对题中包蕴的微言大义，必须依据古儒和程颐、朱熹等人的传注来阐发，不仅不得别出心裁，自抒己意，还要“代古人语气为之”^②，即要体会题中语气，处处把自己设想为古代圣贤人物来代之阐说。士人们“一题入手，全于心灵精脉声口骨节中揣摩刻画”。

朱元璋还规定，“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③。到宣德以后，更形成选官“以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④的局面，且“三场取士，专注头场”，即只注重头场的七篇八股制义，这就诱使天下士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无不竞奔于八股文写作之路，并以之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童而习之，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八股文的写作中去，不登进士金榜，极少有人丢弃八股文的写

①张岱：《文苑列传总论》，凤嬉堂抄本卷二〇二。

②《明史》卷七十《选举志》。

③《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

④《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



作。朱元璋精心设置的从《四书》《五经》中摘取字、句作文题，并必须依照程、朱的传注，以古人语气来阐发题旨的做法，使八股文成为向士人灌输儒家正统思想的最有效工具。

清代学者、八股文名家方苞以过来人之经历对此看得十分透彻。他说：“制义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归于正也。”^①

历史经验表明，儒家正统思想最适合中国封建社会，以之为指导思想，并用以培育、选拔人才，最容易造成思想、文化的大一统，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在八股文由初创到逐渐定型的过程中，其内容由最初的为皇帝歌功颂德向阐发书旨中的微言大义演进。特别是朱棣颁行了《御制四书大全》、《御制五经大全》之后，书中的传注只取程颐、朱熹二家，士人们在八股文的写作过程中对程朱理学的依赖性便越来越大，思想束缚越来越严。

八股体式的逐渐完善，又保证了儒家思想得到准确、全面、深入阐发。

作为一种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八股文的体式完备而苛严，由破题、承题、原题、起讲、入题、提二比、中二比、过接、后二比、束二小比、大结等部分构成其标准格式，结构严谨，章法细密。不过，在洪武十七年甲子（1384年）重开科举时，八股体式刚刚创制，大体沿袭宋元经义的做法，除破题、承题、起讲为体式中的固定部分外，八股之式虽也有人使用，功令中却未把它列为必具部分，句子或对或散，音律不论，未成定式。

①《钦定四书文·奏折》。

然而，初创时的八股体式，不利于考生大量增多时判卷的快速、准确，只会方便敷衍传注，而不利于对文题所含微言奥旨的全面、深入阐发；正文部分或对或散，文无定式，不宜于培养士人传统的诗、赋写作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体，不足以承担逻辑思维训练的任务。改造、完善八股文文体形式的任务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经过长期的乡、会试考试实践，一些有才识、有思想能力的考官们便根据所积累的丰富经验，通过刊刻程文与墨卷的方式对八股文文体不断进行改造、创新，增添了八股部分，从而使八股文对义理的阐发能更深入、全面，对思维能力的训练更为有效。

分析八股文文体从初创到定型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它是沿着强化文章内在的起、承、转、合逻辑关系和讲究声律的道路前进的。自通篇言之，起讲为起，提二比为承，中二比为转，后二比为合，其间的逻辑关系十分严密。分而言之，起讲、提比、中比、后比之内各有起、承、转、合。这样的篇法设置，既可使文题内蕴的义理得到全面、深入的阐发，又可有效提高写作者的思维能力。

对八股文文体的改造和完善，不仅表现在对篇法的探求与改进上，还表现在对声律的注重。为使八股文作者得到文辞的训练，考官们吸纳了唐代试律诗和试赋的特点，改变了八股文初创时八股部分或对或散，单行散句尚复不少的作法，规定八股中相对两股必须对偶成文，这使得八股文的格式变得严密完备。齐全苛严的功令，更使人困难见巧。这样，“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①，“排比牵合，格律篇同之”^②的八股文已告定

①江国霖：
《制义丛活·
序》。

②吴宽：《抱
翁家藏集》
卷四十一
《旧文稿序》。

型。从此，便越来越强调在八股格式的框架内来深入阐发书旨，使人因难见巧，训练士人在种种束缚下的思维能力。

程式完备的八股文专取《四书》《五经》中的字句命题，文章只能恪遵传注来阐发题旨，行文的方式，篇章的结构，词句的使用，甚至字数的多少，都有严格的规定。写作时还须精心揣摩古代“圣贤”的心理、思想及行为方式，代圣贤立言。这些规定有一项不达标便被视为不合格，就会与功名富贵绝缘。在切身利益的驱使下，写作者必然皓首穷经，竭尽心智去揣摩八股文的作法，久而久之，他们的思想便融入了儒家正统的范畴，不敢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八股文就这样成为明代最高统治者构筑思想文化大一统的最有效工具。一方面它培训出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和一定思维能力的大批官员，为巩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士人思想的自由发展，创新能力的提高。其功罪都十分明显，因而在它身上集合了许多的背反现象。

八股文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无论是内容或格式都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故被人称为“时文”。顾炎武说：“时文之出，每科一变。”^①乾隆皇帝说：“时文之风屡变不一。”这些言论都揭示了八股文随时代而变化的属性。追寻明代八股文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八股文的面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折射出时代变化对它的巨大影响。清代道光年间学者李祖陶曾说过：“制义创自半山，明以来沿以取士，其初不过讲明书旨，其后纬以义法，文体渐成。其后荆川、震川之徒，以古文大家气魄，运之时

①江国霖：
《制义丛话·
序》。

①李祖陶：
《文选制义·
序》。

文，遂臻极盛。又其后或讲机局，或尚才情，或喜词藻，日新月异，五百年无一定之规，或征引及于子书，或摹仿涉于集部。至我朝，变态已极，莫可端倪，或思深力厚如天崇名家，或崇论宏议如国初长辈。”^①

这段话以精炼的语言，准确地勾勒出明代八股文发展变化的过程，揭示了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为后人研究明代八股文史指示了门径。从朱元璋与刘伯温创制八股文之后，明代八股文便进入了完善、成熟、鼎盛、变革、衰颓、救亡的发展变化过程。

从洪武到成化前的这八十来年的时间，是明代八股文逐渐走向定型的阶段。

洪武时，文体初创，程式未定，经义不涉八股，且多用颂体。永乐后期，八股格式已广泛使用；到宣德后期，八股格式已基本定型，完成了由颂体向论说体的演进。从此，八股文在周密的逻辑和工整、对仗的固定格式规范之下，题旨得以全面、深入的阐发，写作者的思维能力得以提高。明代前期思想定于一尊，言论定于一律的文化专制局面，主要赖全国士人自觉自愿的八股文写作过程得以形成。

由于明代前期的最高统治者大多能励精图治，社会风气较为淳朴，故这时的八股文内容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②。其文短小，格式简单。永乐、宣德时期大多两比四句，或对或散，尚无定式，为宋四六之流派。其词简朴，绝无华词丽藻，“不过敷衍书理而已”^③。这时的八股名家如于谦、商辂、岳正、丘濬、王恕、李东阳等，其文浑朴，无意求工，而古质庄严，笔力

②方苞：
《钦定四书
文·凡例》。

③《明文传
薪·序》。嘉
庆十年厚载
堂刊本。



沉雄，精光毕露。其雅正之风，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的许多八股名家所尊奉。

在这个阶段，八股文题基本上都是意义完整的整节、整章经文，连意义完整的单句题都少。这种命题方式，不致割裂经文，从而保证了朱熹以传注构撰的理学系统的完整性。

然而，《四书》《五经》这个试题库的容量有限，年长日久，这些经典中没有哪一个意义完整的句、节、章没有出过试题。这就产生八股取士制中一个不可根绝的弊病：拟题与剿袭。一些投机取巧之徒，事先猜题，再选择几篇墨卷程文将它熟记，若试题猜中，只须在考场中将范文背写出来，往往高中，所以李贽说：“吾熟读烂时文百馀首，进场做一日誊录生，便高中矣。”^①流风所及，仿效之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束书不观，只读坊间所刻各种程文墨卷选本的不良风气，使八股文向士人灌输儒家正统思想的功能大为削弱。

为防止作弊，在不改变从《四书》《五经》中出题的祖制的原则下，大约从宣德年间开始，乡、会试考官便割裂经文，或截上或截下，甚至截上句中片言只语，与下句、下节，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下章的词、句相连，构成所谓截搭题，用以难士。这样组合成的八股文题俗称为小题。这种随意割截经文出题的做法，固然让人摸不到出题规律，猜不中题，也无范文可供背诵，对防止猜题作弊有一定作用，还可训练提高作文者的思维能力，但它却将程朱精心构撰的理学体系破坏无遗，动摇了程朱理学的权威性，为明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思潮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是

① 转引自张岱《文苑列传总论》，凤嬉堂抄本卷二〇二。

为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

从成化到弘治，这是明代八股文全面成熟的阶段。

八股文的文体格式基本定型后，经历正统、景泰、天顺二三十年的写作实践，其标准格式已为士人所掌握，到成化年间，更是运用纯熟。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不齐，至成化、弘治则裁对整齐，机调圆熟。八股文的基本写作方法，至此时也已十分完备，为后人所沿用，并遵之为“成、弘法脉”。各种小题题型的文体模式也已定型，并被士人所熟练使用，号称“众体皆备”。故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说：“弘治、正德以后气机始畅，篇幅始长，笔近八家，便于摹取。”

在这个阶段，还产生了王鏊、钱福这样的八股文大师，其文被后世奉为时文正宗，其法被称为时文正脉。此外，这个时期八股文名家大批涌现，如吴宽、邵宝、唐寅、徐渭、王守仁等，其文皆明体达用，理足气充，备受后世称赞。

从总体而言，在弘治以前近百年的时间里，八股文传输给士人的是纯正的儒家思想，是统治者将思想文化定于一尊的最有效武器。以“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选拔出来的官员，一般都能遵循正常的社会治理法则，故这时的吏治较为清明，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朝廷中尚未出现被后世称为大奸大恶之徒，从而实现了社会的长期稳定。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弘治时期，还成为有明一代的太平盛世。

然而，八股文却严重地阻碍了明代前期学术和文学的发展。

因为八股文使得广大士人的思想受到儒家正统学说的

有效控制，他们无不以儒家正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自然难以在认识领域里有新的创造。且“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①，即便是儒学本身于其中也难以获益。这个时期，不仅没有产生诸如董仲舒、韩愈、周敦颐、程颐、朱熹之类的大儒，连元代许衡、吴澄这样的儒学名流也没有出现过。《明史·儒林传》的序言中说：

“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馀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八股文所造成的思想定于一尊扼杀了人们的创新能力，使明代前期的学术领域变得如此萧条黯淡。

八股文还造成了明初百年诗文的衰微冷落。在八股文的影响下，内容陈腐平庸，充满道学气味，形式刻板呆滞的作品充斥文坛。明末清初黄宗羲在选编《明文案》时说：

“某曾校其中十人为甲案，然较之唐之韩、杜，宋之欧、苏，金之遗山（元好问），元之牧庵（姚遂）、道园（虞集），尚有所未逮。盖以一章一体论之，则有明未尝无韩、杜、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文，若成就以一名一家，则如韩、杜、欧、苏、遗山、牧庵、道园诸家，有明固未尝有其一人也。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求之韩欧集中，无是也。”^②

造成有明一代文学无大家，文学变衰微的原因，首先在于八股文塑造了士人的灵魂。

① 杨慎：
《丹铅总录》
卷一〇。

② 黄宗羲：
《明文案·
序》。

随着明代前期八股文文体的逐渐完善和成熟，功令的渐趋严密，士人在八股文写作过程中对《四书》《五经》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思想受理学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既然文学创作的主体——明代士人的灵魂受到了理学思想的塑造，当他们在从事创作活动时，必然会自觉地或下意识地以理学思想为指导。这样，随着八股文的逐渐成熟，士人的思想会愈益正统化，愈益不敢表达其真情实感，其笔下的作品便会愈益道学化。明代人认为归有光的古文为明代第一，黄宗羲却指出，归有光的古文，“试除去其叙事之各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求之韩欧集中，无是也。”归有光的文章大多雅正严谨，却神气较少。黄宗羲指出这种特征是“时文境界间或阑入”而造成的，故他便成不了大家。

造成明代前期文坛衰微冷落的原因，还在于经过长期八股文写作，八股文极端刻板的程式化的格式已深深地烙入了士人之心，使其思维模式化。士人们作为明代诗文创作的主体，在进行创作时，八股文文体程式所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便会产生作用，既“使人笔势拘繁，不得驰骛，以肆其所欲言”^①，又使作品带有八股时文的形式特点。

黄宗羲在论及明代诗文不能出现大家的原因时还指出：因明代“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馀以为古文，其不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②张岱则说：“有人于此，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③

八股文写作耗费了士人毕生精力，又使写作者的心思变得陈腐，眼界变得狭小，人品变得寒酸。这样的人去从

① 吴宽：
《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一《旧文稿序》。

② 黄宗羲：
《明文案·序》。

③ 张岱：
《石匮书·科目志总论》，凤埭堂抄本卷二十六。